

跋涉的理性

(第二版)



孙慕天 著



科学出版社

跋涉的理性

(第二版)

孙慕天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从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的角度全面总结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学术著作。作者对横跨 108 年的苏联（俄国）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全景式的展示，研究了自然科学哲学领域的思潮演进和重大事件，重新评价了一系列重大的学术公案，总结了处理自然科学、哲学和政治关系方面的教训，反思了学者走入误区的历史原因。作者着重分析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领域主流和非主流学派的斗争，探讨了具有改革倾向的科学哲学家的原创性观点，凸现了“异端派”在科学哲学思想上的突破。

本书注重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与西方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导向在自然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优势，进而对自然科学哲学的特殊学科地位做了全新的反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跋涉的理性/孙慕天著. —2 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4
ISBN 978-7-03-064777-1

I. ①跋… II. ①孙… III. ①自然哲学-哲学史-俄罗斯-1883-1991
IV. ①N0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55999 号

责任编辑：邹 聪 孔国平 李俊峰 / 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徐晓晨 / 封面设计：有道文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鹿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20 年 4 月第 二 版 印张：24

2020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 字数：350 000

定价：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再 版 序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导向，与西方科学哲学相比，是另一个参考系，它在哲学理论上有着重大的失误，但也有优于西方的宝贵理论成就。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都是一笔丰厚的思想资源。

——孙慕天

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界乃至整个哲学界而言，无论是过去的苏联自然科学哲学（Совет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研究，还是今日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Росси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研究，都属于“冷学问”。这是因为，首先，科学技术哲学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由于它的交叉边缘性质，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哲学素养，还要有比较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要有广泛的涉猎。其次，由于苏联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研究者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由于苏联前期科学技术哲学的主题是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尤其是物理学和生物学哲学问题，所以在诸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遗传学等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再次，研究者要能够熟练地使用俄语。而为了和西方科学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还要能够阅读其他西方语言的文献。总之，从事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是要付出超常努力的，但并不因此就会得到更多的回报。说白了，研究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投入”和“产出”并不成正比。然“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科学的唯一标准是真理,岂能以冷热分高下。在改革开放之初,踏入不惑之年的孙慕天先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在龚育之先生的耳提面命和大力支持下,在远离学术中心的祖国边陲黑龙江开始了“边缘上的求索”。

先生是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20世纪80年代,先生在这一领域开创了若干个“第一”: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创立了全国第一个“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研究所”(1987年),主持召开了首届(1984年)和第二届(1987年)“全国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研讨会”,主编出版了第一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1989—1990)”,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期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动态》。他的系列论文《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动向》(1985年)、《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1987年)、《开拓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论科学认识论在苏联的发展》(1989年)等成为这一领域的基础性文献。先生和他的战友们戮力同心,把20世纪80年代打造成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先生是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大推进者。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学术期刊停刊,丛书不再出版,学术研讨会中断,研究队伍解散,这一研究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关键时刻,先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2006年,先生积三十年功力撰著的代表作《跋涉的理性》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梳理了自普列汉诺夫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到苏联解体一个多世纪自然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从外史和内史相结合的角度,对思想观点的演变、重大事件的争议、理论学派的分化做了系统的反思。该书的出版不仅一举打破了由于苏联解体造成的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长时间沉寂的局面,而且使学界看到了与英美并行的另一类科学哲学,开创了国内比较科学哲学研究之先河。先生和他的弟子们齐心协力,开创了21世纪初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白银时代”。

先生还是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领路人。从初涉这一研

究领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40年间先生始终是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大纛和灯塔。退休以后，先生依旧笔耕不辍，最终积劳成疾，他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和角膜修复手术，右眼视力几乎完全丧失。尽管如此，已近耄耋之年的先生还是出任了“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科学出版社出版）和“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译丛”（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套丛书的主编，并且亲自操刀撰写专著、翻译译著各一部。在他的遗作，也是《跋涉的理性》姊妹篇《迷思后的清醒》一书的“结语”中，他还对推进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从纵向上，要重新反思和总结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科学地预见发展趋势。特别是要从社会主义道路和本质的角度，立足意识形态与整体社会语境的关联去揭示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特点；从横向上，最重要的是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和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进行综合研究，着力揭示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理论特点并给出合理的历史评价。他还指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重新聚集队伍和培养人才，要有针对性地招收符合条件的学生定向培养，特别是加强语言和实证科学基本功的训练，逐渐形成一个少而精的年轻队伍。先生的学术遗嘱高屋建瓴、语重心长，指明了新时代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战略性走向，对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价值。

《跋涉的理性》一书是先生60年学术生涯的代表作，是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经典文献。“一个民族的智者为探求真理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这是理性的长征，理性在跋涉。”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客体和主体两个视角解读书名“跋涉的理性”：从研究的对象和客体角度，当年苏联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在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压制下所做的探索是艰苦卓绝的，他们抱定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坚定自己认定的信念，坚守学人应该具备的操守，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科学认识论做出独立解读，在科学和哲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条探索真理的道路注定是崎岖坎坷、荆棘密布的；从研究者和认识主体角度，研究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注

定是一条远离庙堂、孤独寂寞,在地理和心理的双重边缘上苦苦求索的理性跋涉之路。先生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四十年间,也时常感到远离热点的孤寂。然而,正像当年红极一时的伪学者米丁一样,喧嚣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堆文化垃圾;而被苏联官方罢黜《哲学问题》主编后打入“冷宫”的凯德洛夫,他的哲学遗产却是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先生是“边缘人”,一生躬耕于学术边疆;《跋涉的理性》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只能置于真正学人的案头。然而,历久弥坚留下的永远是伟大者的思想与智者真理的教诲,这才是人类文明与精神世界的基石。

《跋涉的理性》对横跨 108 年的苏联(俄国)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全景式的回顾,是一部从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的角度全面总结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学术专著。除去“导论”和“结论”外,全书共分为四章,也就是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展分成了四个时期:开辟时期(1883~1924 年)、探索时期(1924~1953 年)、调整时期(1953~1985 年)和转型时期(1985~1991 年)。第一章主要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学术思想为主线,分别介绍了普列汉诺夫的自然科学哲学思想和列宁对自然辩证法的伟大贡献。着重指出,普列汉诺夫是苏维埃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先驱。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遗产的直接继承者,列宁提出了正确处理科学和哲学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哲学遗嘱。列宁不仅开拓了自然辩证法的新领域,而且建立了新的自然科学哲学命题,拓展和深化了恩格斯的理论观点。第二章的时间跨度是从列宁逝世到斯大林逝世进而延伸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形成和建立时期,也是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形成和探索时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这一时期前期有过两次大批判运动,分别是围绕着反对机械论和反对德波林派展开的,这两次大批判实质上都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以行政手段裁决包括自然科学问题在内的学术是非。这一时期后期则以反世界主义为名对整个苏联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整肃,主要包括物理学领域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批判,化学领域对共振论的批判,生物学领域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等。黄钟

毁灭，瓦釜雷鸣，结果必然是伪科学泛滥，滋生出李森科和勒柏辛斯卡娅这样的怪胎。第三章的时间跨度是从赫鲁晓夫改革延伸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这一时期对斯大林时期的许多做法进行了纠正甚至否定，是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改革和调整时期，主要调整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着重指出，不仅要正确对待西方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而且应该把学者在科学上的成就和他们的政治立场、哲学观点严格区分开来。这一时期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打破了之前自然本体论的垄断地位，完成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研究的重大转向。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生的又一次转向，即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改革”相呼应的自然科学哲学的人文化转向。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进步的哲学和社会问题以及关于人的综合研究成了苏联哲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着重指出，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六年之中，在整个苏联理论界“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一种时髦。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关于辩证法本性问题、理论和经验的关系问题、科学理性问题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苏联学者独立地提出了互补性原理、科学的理想和规范、后非经典科学等原创性概念。如果无视这笔丰厚的思想资源，就是重大的文化损失。

距离《跋涉的理性》第一版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市面上早已是洛阳纸贵、难觅踪迹。先生在世时就有意再版，但因主编两套丛书分身乏术。直到今年清明节先生突发心梗、溘然长逝，再版一事终成绝唱。好在先生身后有一千矢志不渝追随其学问人生的弟子，大家在短时间内就成立了“孙慕天遗作出版基金会”，加之科学出版社的全力配合，最终促成此事，以此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先生生前最喜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

人们将洒下热泪。”^①先生的一生是无私奉献苦苦求索的一生，是质朴仁爱侠肝义胆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厉行启蒙的一生，是知行合一勇往直前的一生。面对先生的骨灰，我们不禁洒下了热泪，但更要立志把先生未竟的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缅怀。

万长松

2019年劳动节

^① 马克思.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459-460.

第一版自序

我们这一代人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而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和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联系。先是爱，在我们年轻的心里，那是一块梦的土地，就像苏联作家巴巴耶夫斯基那部小说的名字——《光明普照大地》；接着是爱转恨，我们都读过日本左派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珍宝岛的枪声中感受“苏修”这个“北极熊”强横的身影；后来恨又转为惊，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红星陨落，一朝瓦解。在我们心中，每当想起这个国家，不禁百感交集。

1988年11月7日，就在十月革命节71周年这一天，我出国访学来到莫斯科。那天晚上我站在红场上，看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想起小时候唱的歌“柔和晨光，在照耀着，克里姆林宫古城墙”，心中真有限遐思。刚刚踏上这片土地，就有两件事情让我感慨不已。那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苏联的一切都像隔着一层雾，透着一种神秘。我往国内发信报平安，到报亭买邮票。我问看报亭的老太太往国外寄信邮资是多少。她问我往哪个国家寄，我反问她：“这有什么区别吗？”她回答说：“往资本主义国家寄是50戈比，往社会主义国家寄只要5戈比。”我又问：“往中国寄信，要贴多少钱的邮票呢？”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那是社会主义国家，贴5戈比的就行了。”啊哈，两大阵营壁垒分明，我们这是来到社会主义的“老家”了。当时住在大学生宾馆，吃饭时，我们几个看见饭厅就进，发现里面简直就是“联合国”，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吃的是自助餐，也没有人收费。我们十分诧异，难道这里像我们

“大跃进”时一样，吃饭不要钱吗？一天后见到使馆的同志一问，才知道搞错了，原来那里是专门给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开设的免费食堂。好啊，人家是社会主义的故乡，我们这是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街上到处贴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庆祝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胜利召开”的红色大标语；一对对新人在列宁纪念碑前或烈士墓前献花；进到大学的课堂，一位哲学教师正讲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的哲学党性原则；还有低廉的、超稳定的物价，无人售票的公交车辆。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社会主义的列车似乎正在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奔驰……

可是，过了一些日子后，却觉得有点不对了。“愤怒的诗人”叶甫图申科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演讲，“愤怒”全发泄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身上，而广场上成千上万的苏维埃人却欢声雷动；电视里每天晚上都在播当年一桩桩冤假错案，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图哈切夫斯基等，不是厘清历史，而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我亲耳听乌克兰人对我说“俄罗斯人正在奴役我们”，乌克兰必须争取解放。生活并不如意：食品和日用品匮乏，又小又酸的苹果一摆出来，人们立即排成长队；中国的羽绒服、雪地鞋都成了抢手货，而商店仓库里积压的鞋子却多达上千万双；官方美元对卢布的汇率是4：1，黑市上却倒过来，是1：9。

这真是巨大的时空倒错。我想起作家王蒙在《访苏心潮》里说的话：“到苏联访问是灵魂的冒险。”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信仰的拷问，灵魂的拷问。我们不能不反思，这就是我们曾经魂牵梦绕的苏联吗？就是那个歌里所唱的“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光明之域吗？在那里度过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我一直在想，苏联的过去和现在本身就是历史之谜，人类要想走向未来，非解开这个谜不可。那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闹得正欢。新年晚上，他在电视台发表新年祝词，我们几个留学人员坐在一起，都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觉得这个国家要出事。

1957年，17岁的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入学时反右运动刚

过，学校要搞教改，为制订新教学方案，系里拿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方案供我们讨论。那是六年制的计划，光数理课程就有七八门，我至今还记得有一门课是“感光器官生理学”，想来是为了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实证科学基础，以便深刻理解反映论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系当然没有那么庞大的课程规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我们所学的专业课程的观点，基本未出苏联主流哲学的窠臼。老实说，苏联米丁之流搞的那一套死条条，根本不能在我这个敏感少年的心中激起哪怕一点点热情，当时我最提不起兴头的就是所谓“原理”课。也许正因如此，在我们心中，苏联哲学差不多就是烦琐僵化的代名词。我一直有个疑问：苏联那么多极有学问的大哲学家，难道就没有一点独创性的思考吗？

来到苏联后，我才知道，原来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有一批所谓“六十年代人”，是苏联哲学中的“反叛”，而且他们恰恰是从科学哲学切入，用哲学语言为改革鸣锣开道。特别是凯德洛夫、科普宁和伊里因科夫这“三驾马车”，所提出的科学认识论观点颇多未发之覆，与西方科学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意思的是，这批人并不跟着西方跑，而是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传统，令人耳目一新。1988 年 12 月 5 日，我在哈尔科夫大学买到什维列夫的《科学认识分析》，此书刚刚出版，我兴趣盎然地读了全书，完全扭转了以前对苏联哲学以偏概全的片面看法。一个民族的智者为了探求真理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这是理性的长征，理性在跋涉，这令我肃然起敬。

苏联哲学改革派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对哲学本身重新认识。哲学是爱智慧，这个老生常谈其实本身就饱含智慧。知识不等于智慧，愚蠢也并非一概源于无知。苏联哲学的“六十年代人”冲破了用“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普遍的规律”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戒律，把哲学看作是启迪智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

很幸运，我在乌克兰邂逅了伊万·扎哈罗维奇·采赫米斯特罗教授，和他就 EPR 悖论与量子相关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合著了

《新整体论》一书，使我尝到了跨文化交往的乐趣。他使我这个异国游子获得了家园之感，也使我亲身感受到真理性的知识是无国界的。每当他以极强烈的好奇心就老子哲学向我发问时，听到会心处，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发着光，常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动。哲学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我常常想：哲学是否也应当和实证科学一样保护发现的优先权？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把亚里士多德“个别就是一般”的命题说成是自己首先提出的吧？在读苏联科学哲学那些充满睿智的文本时，我总有一种感叹——我们有时当作新发现来讨论的一些主题，人家早就研究过了，那些文献白纸黑字，赫然摆在那里，而我们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大搞重复劳动，一再从头做起，这岂非大悖于学术规范？总之，从那时起我就想系统介绍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至少要让国人知道，在我们的一个伟大邻国那里，有一笔丰厚的思想资源是值得开掘的。科学无国界。我曾片段地读过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惭愧得很，由于学力不逮，并未真的读懂。但钱先生那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学术眼光，却使我大为叹服。我常想，如果能有钱先生的学术水平，开展东西方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一定会大有收获。我在自己的这项研究中，也稍微做了一点这方面的尝试，东施效颦，只能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苏联解体打乱了我原来的计划。形势大变，很多问题必须重新反思，而且大量档案的解密，使得对一些历史事件也应当另做评价，这项工作开始于15年前的工作于是耽搁下来。近几年尘埃落定，我觉得对一些重大问题已经可以做出结论了，在朋友们的催促下，终于鼓足勇气，把这份稿子提交读者批评。面对此稿，转首四顾，不免也有些微伤感，学术界的浮躁对纯粹科学的追求已经造成了太大的干扰。当时代艰苦时，文以载道，文化人立德立功立言，甚至不惜以身相殉；方今盛世，市场勃兴，食利主义原则进入学术而使斯文扫地。19世纪末，恩格斯有感于德国工业化后哲学的衰落，曾说：“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

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衷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真是慨乎言之。

文学家孙犁说：“彩云散了，记忆中仍是彩云；莺歌远了，记忆中仍是莺歌。”生活的这一阶段已经永远逝去，但它却是美好的，我为此而深感欣慰。

孙慕天

2005 年国庆节

目 录

再版序	i
第一版自序	vii
导论	001
第一章 开辟时期（1883～1924 年）	015
第一节 自然科学哲学在苏维埃俄国产生的历史前提	015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的自然科学哲学思想	024
第三节 列宁对自然辩证法的伟大贡献	035
第二章 摸索时期（1924～1953 年）	057
第一节 斯大林模式和科技进步的指导思想	058
第二节 “大转变”时期的两次大批判	072
第三节 李森科事件和自然辩证法的蒙羞	088
第四节 反世界主义和伪科学的泛滥	107
第三章 调整时期（1953～1985 年）	152
第一节 两次不成功的改革尝试和新旧思想的更迭	153
第二节 调整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175
第三节 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	221

第四章 转型时期（1985～1991 年）	249
第一节 改革的歧路和理论的迷思	250
第二节 人道主义和自然科学哲学的人文化转向	26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命运	293
结论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地位	328
参考文献	360
第一版后记	366

导 论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 70 多年，这是一段伟大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进程。苏联的兴起和它的解体是 20 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它的反思日见深入，历史的真实本质也开始显露出来。

苏联的历史道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它的整个社会生活始终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特别是它的党和国家的各项活动，从来都是和自觉的意识形态设计及意识形态斗争密切联系着的。而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整个苏联意识形态体系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所谓独特，主要是因为它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苏联社会的精神特质，传达了苏联在促进科学发展和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双重努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曲折演化的种种消息。这一领域浩瀚的文献积淀了几代苏联学者不可计量的心血，其中不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创见和辉煌的理论建树。而曾几何时，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陈迹。

难道这一切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吗？难道可以无视这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吗？我们不能无视历史，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这一页精神史轻率地翻过去。萨顿（J. Sarton）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科学史的研究应当是对人类历史的认真解释及其最崇高的命运的展望。人类是在一个毫无希望的圆圈上，像在地狱的圆圈上团团转吗？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欺诈、虚荣和伪善之外难道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人们是否能